

中国日常生活研究范式、实践与路径探究

杨筑慧 包莉莉

摘要: 日常生活对于个体来说,既是外在的、独立存在的、结构化的领域,又是进行实践活动与意义生成的场域。作为一种分析范式,日常生活研究打破了宏大理论的叙事传统,为我们理解微观层次的价值世界、个体实践、文化互动、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多元的分析框架。将日常生活作为方法和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对于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践和内在逻辑,探讨个体或群体的生活际遇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深入考察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处境等,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结合现代性与本土性、结构性与能动性、多元性和流动性、传承性与发展性,从时空、生活与制度、城乡、生产与消费以及“物”与社会文化的维度,勾勒中国日常生活的图式特征,可以为构建立足于中国语境的日常生活研究提供启发性思路。

关键词: 日常生活;实践性;现代性;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2-0091-09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研究发轫于西方,从理论引介、应用与反思到立足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展开微观的或日常生活的研究,是增强理论解释力、构建本土学术理论的重要实践。

作为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日常生活是人类展开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具有历史性、重复性、实践性、烦琐性、物质性、多样性等特点。日常生活包含着人们的吃喝拉撒睡等惯常行为,这使其往往被视为非本质的、习以为常的、给定性的、琐碎、平庸而单调,缺乏活力与生机。因而,在较长一段时期

里,学术界更关注那些宏大的叙事,正统的史学也往往将王朝更迭、精英人物作为记述的对象,着力于社会制度和重大社会活动的研究,对普通的或大众化的日常生活缺少应有的重视。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是由理性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西方学者重新思考日常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关注社会事实层面的经验世界,并日渐将其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思想。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日常生活自提出以来,逐渐由哲学领域向其他学科领域延伸。在学者们的笔下,日常生活实践充满质感与意义,蕴藏着多维的互动关系与结构化机制,映射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个体与文化、国家与社会、历史与当下的张力。本文在溯源既往日常生活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国内日常生活研究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旨在拓展中国本土日常生活研究的范畴,为构建中国特色日常生活研究路径和知识体系提供启发。

收稿日期: 2024-09-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专项项目“南方民族糯稻文化与文明互鉴研究”(19VJX144)。

作者简介: 杨筑慧,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包莉莉,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文化与旅游休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1)。

一、日常生活范式: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

日常生活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方式,任何个体和群体都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生息。何谓“日常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其内涵与外延具有不同的认知与阐释。

“every”源自中世纪英语“everiche”,“everyday”作为形容词,可译为“每日的;日常的”^[1]。第七版《辞海》对“日常”并未做释义,但对“生活”有专门解释,可指人的各种活动,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也指生存、活着,生涯、生计或工作、手艺^[2]。据此,日常生活可以被理解为人们日常的各种活动或生存状态。显然,这些认识与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的定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现象学之父埃德蒙德·胡塞尔在其经典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提出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概念,指出“生活世界是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3],以此来批判与反思现代科学理性。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相似的概念——“生活形式”(lebensform),并认为语言是人的活动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4],试图将语言从抽象的逻辑回归到生活世界。奥地利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认为,“日常生活的世界”在我们出生很久以前就存在,以“现有的知识”的形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5]。这里,舒茨强调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先在性。此外,存在主义哲学对人在世生存的本质的反思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6]。

20世纪4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宏观批判转向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是具体而独立存在的,同时也是结构化的。日常生活不等同于现实,现实没有包括日常生活的抽象内涵,如“活生生的经历、转瞬即逝的主体性”^{[7]547-552}。日常生活也不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而是作为生产方式的基础领域的独立存在,包括表现形式和深层结构,同时是个人的、群体的(家庭、同事和朋友等)、社会的^{[7]544-579}。列斐伏尔深刻揭示了由技术理性和消费社会构建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内在本质,对日常生活本身的衰落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主要体现在其不同时期所撰

写的《日常生活批判》三卷本中。同时,一些著名思想家如居伊·德波、鲁尔·瓦纳格姆、阿格妮丝·赫勒、卡莱尔·科西克、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也基于各自的研究,从现实关怀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在日常生活世界的生产、消费与精神等领域的全面异化展开深刻批判。

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批判主义路径不同,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强调日常生活是实践的场域,在对社会精英主导的生产与消费领域加以理性剖析的同时,强调大众作为日常谋略者和实践者的创造性,关注大众日常生活细微的环节,将目光投向底层与弱者,书写大众的日常行动策略与生活美学。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等,他们从不同视角使用实践概念来分析社会理论中的基础性议题。在社会学领域,一些学者基于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等的启示,强调了个体或行动者在结构规则中的“策略”或“行动能力”,以反思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事物与现象,如欧文·戈夫曼的“拟剧论”、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等。后现代理论则试图解构日常生活的既定意义和宏大叙事,强调差异、多元,如让·鲍德里亚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媒介、身份认同等关注。

可见,基于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和对人类生活境遇的关注与思考,学者们试图从生活世界找寻一条鲜活的认知人类社会生活的路径,并建立起具有严格知识体系的研究范式,从而显示出其与具体的日常活动的区隔。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是先天的、结构化的,是为人的生存与价值创造提供基础要素而又独立存在的领域,同时又是动态的、多元的,由日常实践不断生成并建构新的意义。如此,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既根植于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又脱嵌于烦琐、重复、庸俗、乏味的日常生活节奏,显示出其深邃的思想内涵。概言之,日常生活研究的不同范式为我们理解个体经验、人际互动、文化实践、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多元的分析框架。纵观日常生活的经典研究与新近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从被视作研究对象到作为研究视角与方法,从对理论创新的追求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从整体性视角逐步具体到某一特殊的主题等一系列特征,为中国学术界展开日常生活研究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借鉴。

二、从引介到本土观照：中国学界日常生活研究的实践

自古及今,日常生活的实践与体验是中国人感受与理解社会生活、生存意义的归依。在中国古籍中,不乏有关日常生活的相关记载与研究,如《礼记》中就包含丰富的日常生活史内容,记载了古人一天的生活安排、一年的时令行事和一生的人生节律^[8]。不可讳言,尽管中国人重视日常生活的内涵与实践,但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去认知、阐释社会生活的意义、变迁与结构,却肇始于西方学者。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表现,日常生活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并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中得到体现和实践,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国外日常生活概念和相关理论的解读、应用或借用,如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以及微观社会学的相关解释路径的分析。在理论应用方面,较多的研究偏向于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切入点,研究城市更新中的空间治理、街区邻里政治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伦理”。随着研究的拓展与丰富,也有一些研究脱离了现象学、社会学等对日常生活概念的界定,仅将日常生活作为普通人生活的文化空间或各种实践的总和。例如:陈辉关于黄炎村农民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伦理的叙事^[9];杨建华对诸如上学、做工、当兵、经商、办厂、纠纷、通婚、分家、送礼、拟亲、游戏等村民的日常活动展开分析^[10],以此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与社区、市场、城市、国家的互动;刘胤和何绍辉的研究表明,底层民众常借用“哭”“闹”等日常“诉苦”策略,表达其遭遇的苦难与困境^[11],这实则是其表达诉求的一种抗争技术;张敦福和阎秀杰通过研究发现,上海居民餐桌剩余食物再利用的日常生活实践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12]。上述学者的研究,初步体现了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日常生活的内在生命力。

二是在对国外日常生活理论加以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重新界定适用于中国本土的日常生活概念或进行理论创新。例如:郑震提出日常生活是中国社会变革力量的斗争场所及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基础^[13];牟宏峰提出了日常生活共同体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日常生活世界是以个体共同的价值认

同、生活方式和利益诉求等为基础,其文化纽带和所处时空场域相对稳固的人类结合体^[14];赵宇峰针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中国的基础社会建设应着力于培育日常生活共同体^[15];张兆曙在“日常生活”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事件性日常生活”,来指代那些不按既定规则和模式进行的、以非暴力的、非正式的和非组织的方式反抗制度安排的日常行为^[16]。需要提及的是,一些学者意识到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民俗在现代日常生活的渗透,进而提出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17],将日常生活作为视角和方法,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理解流动的民俗和人们所意向性地建构的社会文化事实,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反思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揭示日常生活的实践性与现实实在性本质^[18]。在上述研究中,理解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的独特性,从日常生活出发构建本土学术概念,以及解释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等学术旨趣逐步显现。

三是中国本土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一种取向是通过解读古籍诠释日常生活的本质与丰富内涵。例如:吴柳财通过对中国传统典籍《礼记·曲礼》的解读,提出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社会结构与时间性等基本要素^[19];戴黍认为《淮南子》传达了日常风俗对于治国理民的价值^[20]。另一种取向是历史学者借助史料进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例如:常建华通过清代嘉庆朝(1796—1820年)刑科题本提供的有关清代中叶江西民众生命史的资料,对当时的人口、婚姻、家庭、谋生手段、生态环境和社会冲突等进行分析^[21];王振忠利用田野调查中所收集到的一批民间文献,结合口述资料,对明清以来徽州朝山习俗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进行细致的描述^[22];陈宝良通过对明代的制度建设和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研究,分析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史^[23]。另外,王笛从微观史学的层面,通过考察成都茶馆的历史、经济功能和茶馆作为社区中心等议题,探讨其中所蕴藏的丰富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24]。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日常生活史确立了中国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为民众,且立足于微观叙事与民众的日常活动,逐渐成为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等研究的基础。

四是将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的研究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和价值秩序结合起来展开讨论。第一,物体现和隐喻着某种生活方式。杨

筑慧在《水井与自来水：一项基于侗族日常生活的类学考察》一文中指出，在具有现代技术意义的自来水引入许多民族村落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和进行信息交流的地方。在侗族社会，水井承载着社会文化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意义。而在自来水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水井逐渐被废弃，“集体”被分割为“个体”，自我与个人主义蔓延，导致村落传统文化被逐渐消解^[25]。第二，“物”承载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内涵。李曰强发现明代在进口胡椒贸易与本土化种植的推动下，胡椒由奢侈品一举变为日常用品，且胡椒在明代的商贸、饮食、医药、军事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26]。第三，物印证了社会变迁。姜立强和张勤谋在《“物”视域中的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日常生活》一文中认为，集体经济时期，农村制度安排具有“去商品化”特征，农民日常生活层面“神圣化”和“去神圣化”并存。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以“商品化”为方向，日常生活中农民“双重分化”。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去商品化”特点改变了“物”的供给逻辑^[27]。中国语境下的日常之“物”，超越了其实用属性，承载了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国家的情感联结，是历史与当下、地方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产生联系或区分的介质。

五是从日常生活角度分析个体如何应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变迁。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提到，要从普通人在其日常生活中应对制度变迁的视角和经历来考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他敏锐地观察到，个体的崛起和社会的个体化正在悄然重塑中国人和中国社会^[28]。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耿琳等通过对广东省军埔村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电子商务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村民的共同价值观及其对村庄的感情和生活节奏。而作为“旧”与“新”的混合体，农村的社会空间被村里的大多数老人划分为“上位”和“下位”。前者是指电子商务集中、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后者指的是传统的农村居民区。老人认同“下位”的传统居住区和更愿意去祠堂寻求安慰^[29]的情感和行为，呈现了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省思与自我调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领域持续地、或隐或显地发生着根本的、深层次的变迁。在此背景下，不同年龄、性别和阶层等个体或群体的生活境遇与主体性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引介和运用国外日常生

活相关研究范式时，除了借助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加以阐释外，也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社会特点，关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经验，对相关理论进行对话或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见。在这些运用中，学者们较为注重实践层面，着力于具体人群的行动或具体场域以及与之相连接的社会事实，呈现出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些特色。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研究仍缺少对时间与空间、生活与制度、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整体性观照，对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社会、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日常生活也缺乏系统性的表达和深度阐释。

三、范畴拓展：构建中国特色日常生活研究路径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地域社会文化丰富，如何从快速变迁的时代内外关联性中呈现日常生活的特质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伦理”，需要我们对日常生活研究的路径作进一步的思考，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研究范式。为此，本文尝试从以下角度思考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进路，以抛砖引玉。

1. 时间与空间

首先，时空观主要从纵横维度探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并在比较中分析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的日常生活行为，呈现出日常生活的动态感，以及导致日常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内在结构等。在此进路中，以小见大、由下而上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力图从微观视角呈现历史的图景。前述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便是对历史维度的观照。中国自古就有史述的传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籍，但在“正史”的叙事中，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人、小人物并不被重视，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宏大的历史场景、精英人物所遮蔽。历史唯物主义将普通人的活动带入史学研究范畴，从而实现了一次哲学层面的范式转移。这种转移一方面克服了过分关注历史活动中观念的因素，凸显物质生产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的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强调了群众的社会生活^[30]。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为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和多维空间提供了深厚基础，如何从碎片化的史料中爬梳不同时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呈现历史发展脉络与社会结构图式，是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

其次，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空观对人们的日常

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将其纳入时空视角,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研究范式。第一,强调对人、自然与社会整体性的关注。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将日常起居、劳作、饮食等活动安排在天体运行和季节更替的框架内,形成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循环时间模式。通过岁时的时间框架,民众将抽象的、不可逆的时间转换为重复出现的日常生活^[31]。故在研究日常生活时,应关注人、自然、社会的内在关联,揭示其互为构成、互相依存的时空运作规律。第二,重视伦理道德的时空向度。中国文化中的“内圣外王”,强调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的统一。日常生活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时空秩序,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序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日常规范,“昼日不足,继之以夜”的时间管理等。由之,分析伦理道德的时空向度如何规约个体的日常实践,以及由此形塑独特的生活方式,是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三,反思现代性带来的时空异化。现代技术将人们的时间观念从农业文明的自然叙事时间转变为抽象化的机器叙事时间,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从具体的事件性空间变为虚拟的功能化空间和无机的碎片化空间^[32]1-4,导致传统时空秩序受到冲击。因而,立足于本土实际,挖掘中国传统时空秩序的当代意义,对于从日常生活视角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平衡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随着互联网技术全面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领域^[33],人们的生活节律被切割为线上和线下两个时空,日常消费、出行、教育、医疗、政务等呈现移动化趋势。在时空加速、延伸,虚拟与真实互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生活和虚拟社交正影响或重塑着个人生活和社会运行的诸多方面,人的价值观念、文化实践、人际交往、劳动与休闲等更具开放性、多元性,并深刻影响着权力主体、运行逻辑和互动方式等,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日常生活主体、日常生活空间及日常生活伦理结构都呈现出新的特点^[34]。显然,关注传统与现代时空秩序交织的日常生活,是探讨新的社会发展图式和实现网络美好生活的重要理论工具。

2. 生活与制度

日常生活实践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与此同时,每一个个体或群体都必然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和政治体系中,如何将国家与个体或群体经由制度化领域连接起来,对此,日常生活无疑是一个较好的视角或方式。“生活与制度”和“制度与生

活”^[35]范式均尝试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关注“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与“自下而上”的日常实践的互动关系。不同的是,“生活与制度”更强调从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制度,注重生活与制度的互动关系^[36]。一方面,国家制度、政策等会影响和塑造个人的日常生活。如在传统社会,国家以礼制塑造日常生活^[37]135。衣冠制度、餐桌礼仪、居住空间的方位差异以及车舆、行进的礼仪安排,是维护秩序与等级的工具。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性需求外,儒家礼乐还渗透于音乐、舞蹈等日常娱乐生活^[38]。又如18世纪,清政府对贵州苗疆进行渐次开发,颁行了一系列政策,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习惯、饮食习俗也随之发生改变^[39]。再如,民国时期,蕴含着三民主义理念与孙中山崇拜情结的中山装,成为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随后演变为个人的正式着装^[40]。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境下,个体也在日常实践中表现出对制度规训的能动适应、协商或抵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消费是被规定为排斥享受的,但泡澡堂却成为北京人的一种生活潮流。尽管当时国家试图建立提供快速便捷沐浴服务的平民浴堂,但是散漫、悠闲、享乐的沐浴传统并未被卫生、节俭、效率等现代社会价值取代,早期公共卫生制度试图对浴堂等公共场所进行规范和管理时也常遭遇抵制^[41]。值得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公共卫生制度建设日渐成为国家通过介入个体及集体健康进行社会治理的实践^[42],影响着个体的日常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故而,国家的政策、制度等会在潜移默化中规训着人们日常的基本认知,也会在短期内快速影响、渗透到人们具体的日常实践。而民众的日常实践同样会与国家制度形成互动。由此可见,“结构过程”既可由国家宏观层面的制度、权力塑造,也可由个体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织造,国家与个人经由日常生活使“结构”处于永无止境的动态中。

3. 城市与乡村

城市和乡村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区域单元,也是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面向。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去认识城市与乡村,分析二者之间的连接或互动关系,不仅能透视现代化、工业化对人类社会生活和环境变迁的影响,也能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以自然节律为基本准则来安排日常活动,人和土地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亲缘关系^[43]。不同于乡土社会,城市生活方式的日渐兴盛,使得其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被视为“进步”与“文明”的代表。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下,系统与生活世界呈现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44]。尤其是在现代性的席卷之下,乡村的主体性面临着极大挑战。基于此语境下的城镇化进程也是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转变,这在发达国家和中国过往城镇化的实践中都有迹可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一直都在调整和演进,从对立竞争转为融合互补,城市逐渐将乡村纳入经济和文化主流^[45]。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也贯穿于日常生活领域,直接体现在卷入其中的社会成员日复一日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产消费、娱乐休闲、看病就医等生活体验与实践过程。当前,在城乡社会转型以及网络社会崛起的背景下,城乡之间的流动更为频繁,互动更加紧密,城乡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其一,随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县域内形成了一种一体化的城乡关系结构^[46]。跨越村庄—县城的时空经验,被编织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日常生活。家庭成员陆续进城陪读、就近务工,农二代进入县城,并成为重要的生活主体^[47]。新生活伦理塑造下的农民家庭脆弱化^[48]、农民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等现实问题,日益显现出“生活革命”酝酿的社会风险。对此,需要将其纳入中国城乡日常生活研究的重点,以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二,在农民进城的同时,部分乡村地区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一些城市精英或中产阶级为了逃避城市的拥挤、快节奏、喧嚣和污染,或基于对追求安静与自由的乡村“乌托邦”的想象等,逐渐从城市流向乡村^[49],在重构乡村公共空间的同时,催生出乡村绅士化现象。由此牵动城乡生活模式的碰撞、调适与平衡,对此,需要回归日常生活的视角加以审视和理解。其三,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活动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乡村地区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空间实践转变为以文化场景为核心的空间呈现^[50],传统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民族传统文化与日常交往活动也由此发生了诸多变化,成为考察中国本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视角。总之,如何经由日常生活探讨当下的中国城乡建设和发展,是一条具有时代特色和内涵的研究路径。

4. 生产与消费

作为日常生活重要实践内容的生产与消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为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曾是许多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生

计类型与消费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作物的种植还是消费行为,往往表现出“无废”的状态。受之影响,生生之德、道法自然、勤俭持家成为日常生活遵循的伦理,村落中人们之间日常交往密切且相互依赖,人与自然、生产与消费、劳动与闲暇,并未出现明显的分化^[51]。而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人口流动与迁移加速,居民消费升级,跨国品牌渗透,生产活动与消费彼此分离,打破了生活世界的宁静与稳定。

社会在向前发展时,劳动与需要满足、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生产单位与生活空间高度重叠,日常生活呈现出整体性与政治化的特征。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使日常生活的功利性增强,个体性抬头。进入21世纪,日常生活消费(尤其是住房等大宗消费)的全面商品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弱化了个人与单位、土地、血缘家庭之间的关系^{[37]110-120}。日常消费越来越被“效率”“便利性”“符号性”“个性化”等要求所规训和控制,并逐渐脱离日常需要的轨道,成为声望、地位、权力、名誉等的象征符号。在此情形下,个体的精神世界被消费主义围困,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遭到侵蚀和损害。当日常生活的失控感日渐弥漫,部分国人或转而去追求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以反思和抵抗日常生活的商品化^[52],或回归中国传统文化重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与情感内涵,其中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国潮”的兴起。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普及,新的生产消费伦理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移动支付、直播带货、虚拟现实、透支消费等重塑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空间的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技术、资本对生产与消费产生的影响,及其同个体生活价值与意义的互构,以及由此塑造的日常生活图景等,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课题。

5. “物”与社会文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物质构成的世界,各种物质以直观、可触及、不同形状、不同质感的外在形式呈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物”既是日常生活实践的介质、方式或手段,也是其产物。通过审视那些司空见惯的“物”,可以揭示人生活的本质与意义,或社会文化意涵,从而窥见日常生活的实在性与发展性,进而构成理解我们自身的独到视角。传统社会中,在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熏陶之下,山水、花草等自然之物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寄托。

而日常之物的流动与交换,则是考察不同区域、族群交互性和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窗口。如云南普洱茶贸易的各个环节将不同的族群连接起来,茶叶赋予了西南区域社会独特的文化叙事。又如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其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过程联结起不同区域的人们,也是一段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日常生活空间包含着一系列的技术物,即美国学者艾尔伯特·鲍尔格曼所说的焦点物,它汇聚各种技术要素而产生事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火炉,不仅把取暖事件汇聚在一起,还会集了全家人的工作与休闲,赋予家庭成员不同的角色分工与地位,代表着家庭运作的时间节律^[53]。日常技术物作为一个焦点,是事件发生的空间性场所,并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分属关系等^{[32]202}。中国古代技术物椅子、门等都具有这样的属性。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技术物更加追求功能性与工具性。如智能手机,既是人们联系外界、彼此沟通的媒介,又是人们工作、消费、休闲娱乐与社交的重要工具。需要关注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会的崛起,现代技术物或数字物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冲击乃至“殖民”,尤其是智能机器人引发的日常伦理问题,是当下及未来重要且不可忽视的研究议题。可见,“物”并非中性的存在,而是植嵌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中。解读“物”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有助于理解日常生活的复杂面貌与相互缠绕的社会机体。

四、中国语境下日常生活研究路径的主要特点

日常生活理论发端于西方学术界,经由胡塞尔、舒茨、列斐伏尔、赫勒、法兰克福学派、德·塞托等不断推进,逐渐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转向,并影响了诸多学科的研究视野。与国外日常生活研究相比,中国的日常生活研究更具经验性与多样性。本文尝试跳出由理论出发去裁剪实践的局限,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并从时空、生活与制度、城乡、生产与消费以及“物”与社会文化的范畴,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研究路径,展现其主要特点。

1. 融合本土性与现代性

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日常生活模式和文化样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近40多年来,“压缩式”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社会正经历快速而深刻的变迁,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本

土与外来生活方式交织碰撞、错综缠绕的样态。尽管日常生活的绵延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而流动,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仍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传统文化成为彰显中国文化自信和激发民众自豪感的宝贵资源。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在不断得到传承与发展,并在人们的日常起居、饮食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如中医将时空秩序内化为身体节律,指导现代人的养生观与身体观。此外,国家与社会改革实践中的独特经验也表明,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如差序格局、重人情、伦理本位等依然是探讨中国日常生活的独特视角。因而,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研究既要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要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变迁,建构和回应时代需求,关注新的社会议题,以揭示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结构内涵。

2. 强调结构性与能动性

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延续的重要方式与基础,是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其中既有结构化的存在,也有实践性、主体能动性的表达。因而,日常生活研究不仅要个体生活实践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考察国家政策和时代变迁如何塑造生活世界,还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对政策、变革等进行回应。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新的消费文化形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捕捉这些变化,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价值。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大背景下,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根本上依赖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美好生活的创造主体是全体人民,需要发挥人民主体性。结合国家治理经验与实践可以发现,立足中国语境的日常生活研究,需要对普通人日常实践的创造性、主体性与能动性加以观照,以拓展日常生活理论的包容性与解释力。

3. 关注多元性与流动性

其一,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社会、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日常生活千差万别,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在。其二,伴随着城镇化和现代交通的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传统的时空边界被打破。如农民工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循环迁移,既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时空观念,也重塑着其流入地的时空景观。而逆城市化流动人口的逐渐增多,也对乡村建设和

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三,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活结构和行为方式带来的冲击,中国语境下的网络生态、网络技术对现代家庭休闲与亲密关系的影响等现实问题日益显现,数字化与虚拟社交极大地改变着传统的互动方式,影响着不同的个体与群体。这种地域性、流动性、网络化生成的日常生活实践所体现的多元复杂性与交互性,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和时代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4. 重视传承性与发展性

日常生活变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变与不变,在日常生活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不变”是承前启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支撑着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平稳有序运行,维护着社会变迁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变”是推陈出新。在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也发生着结构性和全方位的深刻变革。随着物质层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居家日用等的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如公民法治素养的提升、性别平等观念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等。但与此同时,当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容忽视的社会乱象,尤其是消费主义、各种社会不良风气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蚀。因此,我们的观察视角和研究路径亟待回归日常生活的基点,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简要梳理西方学术界日常生活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探讨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践,揭示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日常生活研究路径与特征。日常生活研究作为一种超越传统宏大叙事的分析工具,强调对普遍存在的、微观层次的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关注,反映了感性与理性、结构与能动的交叠。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研究路径时,应从生活世界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中发现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从国家与人民的互动中理解日常生活的结构化特征,推动学术界对日常生活研究的深化和创新。

由之,一方面,我们能够更好地从微观层面来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与现代转型,以及在这一过

程中普通人适应和塑造他们的生活世界的逻辑和方式,在琐碎、平庸、重复的生活实践中呈现出结构性与创造性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须在中国语境下对西方日常生活理论加以审慎对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既要立足中国悠久的文明发展史,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提炼理论资源,构建本土化概念体系,又要在批判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契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研究路径,力求实现理论自觉与问题意识的有机结合,从而不断推动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入认识。

参考文献

- [1]高玉华.简明英语词源构词词典[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80.
- [2]陈至立.辞海[M].第七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3881.
- [3]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61.
- [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楼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7-16.
- [5]舒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84.
-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13-222.
- [7]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8]杨华.《礼记》与日常生活史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23(4):194-203.
- [9]陈辉.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
- [10]杨建华.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浙江学刊,2002(4):75-80.
- [11]刘胤,何绍辉.日常生活中的诉苦:作为一种抗争技术——兼论底层研究的拓展及进路[J].求索,2014(2):34-38.
- [12]张敦福,阎秀杰.节俭与环境可持续性:上海餐桌剩余食物的日常生活实践[J].广东社会科学,2023(5):203-213.
- [13]郑震.论日常生活[J].社会学研究,2013(1):65-88.
- [14]牟宏峰.论日常生活共同体及其界域划分[J].浙江社会科学,2010(6):66-70.
- [15]赵宇峰.重构基础社会:日常生活、共同体与社区建设[J].社会科学,2017(4):3-10.
- [16]张兆曙.事件性日常生活:概念、形态与社会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6(4):120-122.
- [17]刘晓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J].民俗研究,2019(3):5-17.
- [18]李向振.找回日常生活:当代民俗学的学术转向与知识生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65.
- [19]吴柳财.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2018(1):54-80.
- [20]戴黍.日常生活与社会治理:试析《淮南子》中所见风俗观[J].

- 学术研究,2010(12):20-25.
- [21] 常建华.生命·生计·生态:清代中叶江西的日常生活——以10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10-128.
- [22] 王振忠.华云进香:民间信仰、朝山习俗与明清以来徽州的日常生活[J].地方文化研究,2013(2):38-60.
- [23] 陈宝良.蒙元遗俗与明人日常生活:兼论民族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融[J].安徽史学,2016(1):33-48.
- [24] 王笛.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0.
- [25] 杨筑慧.水井与自来水:一项基于侗族日常生活的人类学考察[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22-27.
- [26] 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J].云南社会科学,2010(1):127-131.
- [27] 姜立强,张勤谋.“物”视域中的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日常生活[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17-121.
- [28]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3-23.
- [29] LIN, XIE, LV. Taobao practices, everyday life and emerging hybrid ru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B):514-523.
- [30] 师义帆.日常生活史问题与进路[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15-16.
- [31] 吉国秀.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实践与中国社会转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78-83.
- [32] 郑雨.现代技术下的日常生活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33] 王昕.日常生活转向中的互联网研究:定性研究方法思考与操作[J].学习与探索,2019(12):36-44.
- [34] 鲁芳.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伦理治理的难题及对策[J].中州学刊,2023(6):120-126.
- [35] 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2014(9):88-104.
- [36] 常建华.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的新探索[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1(1):25-30.
- [37] 鲁芳.日常生活的变革与伦理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 [38] 朱承.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33-337.
- [39] 王健.食味与历史:贵州东南的糯稻、族群与国家[J].青海民族研究,2020(2):81-90.
- [40] 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J].学术月刊,2007(9):139-147.
- [41] 宋子昕.塑造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浴堂与市民沐浴实践(1900—1952)[M].北京:燕山出版社,2023:523-537.
- [42] 李洁.从“制度”到“生活”:新中国70年来公共卫生政策演变[J].中国公共卫生,2019(10):1281-1284.
- [43] 费孝通.社会学讲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43.
- [44] 董磊明,谢梅婕.故乡可安身:古源村的扎根型城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393.
- [45] 刘守英.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J].中国乡村发现,2022(3):11-14.
- [46] 白美妃.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城城乡关系再认识[J].社会学研究,2021(6):45-67.
- [47] 雒珊.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J].中国青年研究,2023(12):14-22.
- [48] 张一晗.“进城宝妈”的新生活伦理及日常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23(12):23-32.
- [49] 黄凯洁,刘美新,廖婧琳.生活方式型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乡村公共空间重构:以成都市明月村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70-79.
- [50] 郑美雁,杜梦倩,彭燕,等.日常生活走向文化场景: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社会发展研究,2023(4):187-206.
- [51] 张敦福.迈向“虚无之物”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一个消费者的视野[J].社会,2006(2):159-174.
- [52] 付来友.自我技术与美好生活:对青年群体“极简生活”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0(8):74-82.
- [53] 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414.

Paradigms, Practices and Pathways of Everyday Lif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Yang Zhuhui Bao Lili

Abstract: Everyday life serves as both an external, independent, and structured domain for individuals and a field in which they engage in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generate meaning. As an analytical paradigm, the study of everyday life disrupts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grand theories, offering diverse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micro-level value systems, individual practices,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vestigating everyday life through this methodological le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 holds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t emphasizes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ordinary people while exploring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circumstances an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Furthermore, it facilitates a deeper examination of China's unique historical-cultural heritage alongside its contemporary realities. We aim to combine modernity and locality, structure and agency, diversity and fluidity,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and depict the pattern features of Chinese everyday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ime and space, living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urban and rural area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things” and social culture, so as to provide inspirational ideas for constructing a daily life research grounded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everyday life; practicality; modernity; localization

责任编辑:翊 明